

目 錄

序言 “新政” 能否改變中國？	012
一、我多麼希望我以前所說的都是錯的	012
二、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是政府不甘心退出市場	016
三、改革停滯，究竟是缺乏共識，還是利益集團阻撓？	018
四、“新政” 能否改變中國？	021

第一篇 中國改革重裝上陣

第一章 “新型城鎮化” 將是誰的盛宴？	027
郎咸平說 “新型城鎮化” 的核心應是 “人的城鎮化”	029
一、“新型城鎮化”：以人為本，不再大搞基建	029
二、農民工數量不再激增，地方政府搞的建設 “大躍進” 無人埋單	031
三、“逆城鎮化” 危機：有效勞動人口減少，財政不堪重負	033
“三言” 堂 “新型城鎮化”：不是建新，而是補舊	035
一、“城鎮化” 核心問題一：農民是因為甚麼進城的？	035
二、“城鎮化” 核心問題二：建大城還是建小城？	037
三、“城鎮化” 核心問題三：政府干預 “城鎮化” 的邊界在哪裡？	039
第二章 我們能和高官腐敗說永別嗎？	041
郎咸平說 法國大革命前的腐敗類型，為何似曾相識？	043
一、大學生當公務員 “爭破頭”，說明政府腐敗問題嚴重	043

二、《舊制度與大革命》啟示一：官員靠“中間人”或在國企內培植個人親信受賄	044
三、《舊制度與大革命》啟示二：權力可以通過審批制和賣官變現	046
“三言”堂 審批制是腐敗的“源泉”	049
一、丁書苗，不簡單	049
二、審批制度滋養貪腐	050
三、“腐敗經濟學”是對的嗎？	051
第三章 治霾要靠舉國之力	053
郎咸平說 政府不作為，導致50年來霧霾愈演愈烈	055
一、霧霾籠罩1/7國土，危害就在我們四周	055
二、中國霧霾半個世紀前已出現，50年來愈演愈烈	057
三、機動車和燃煤是加速霧霾惡化的主要原因	058
“三言”堂 治霾成了考評政府的新標準	061
一、讓PM2.5和政績考核掛鉤，霧霾問題很快就能解決	061
二、建立官員“問責制”，追溯過往亂投資	063
三、在聯動機制的基礎上，建立國家級治霾體系	065
第四章 上海自貿區不只是“看上去很美”	069
郎咸平說 上海自貿區：抵禦美國“ABC世貿”的重要一擊	071
一、自貿區在短期內不會讓老百姓感受到切實福利	071
二、美國繞過WTO，組建“ABC世貿”阻擊中國成長	073
三、戰略價值：靠自身開放以及國際合作，對抗“ABC世貿”	074
“三言”堂 上海自貿區的職責應是利惠中國企業	077
一、解決民企的國有待遇才是第一要務	077
二、給市場放權，才能培養出世界級企業	078

第二篇 經濟弊病無處遁形

第五章 漲價不是改革紅利	083
郎咸平說 “無路可走”的民資推高房價	085
一、世界其他主要國家的房價都在跌，只有中國樓市“不正常”	085
二、根治中國高房價的藥方：抑制通貨膨脹+改善營商環境	088
“三言”堂 衣食住行都在“漲”	092
一、新加坡版“居者有其屋”	092
二、美國憑藉“页岩氣革命”，獲得改革紅利	094
三、鐵道部被拆分，票價接著漲	096
第六章 華人首富李嘉誠是在“撤資”嗎？	099
郎咸平說 李嘉誠的“財富寶典”	101
一、李嘉誠拋售內地資產400億，不過是總資產的九牛一毛	101
二、李嘉誠全球戰略大佈局：投資歐洲，主攻英國	103
三、李嘉誠投資秘訣“三板斧”	104
“三言”堂 沒有好的投資，李嘉誠當然“撤”了	109
一、歐洲有風險，投資需謹慎	109
二、李嘉誠帶走的只是資金，而中國最不缺的就是錢	110
三、李嘉誠為人：保守+節儉+謙恭	112
第七章 房產稅是稻草：拯救樓市？還是壓垮“房奴”？	115
郎咸平說 房產稅的根本屬性：地方政府新稅源	117
一、推出房產稅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117
二、房產稅“杭州模式”或導致地方政府放開“限購令”	119
三、房產稅一旦全面徵收，買不起房的人更買不起	121

“三言”堂 房產稅，不靠譜	122
一、房產稅和打壓房價、均財富沒有關係	122
二、開發郊區房：地產商靠大盤成名，地方政府收更多房產稅	124
三、房產稅既不能遏制房價增長，也沒有還富於民	126
第八章 “地下世界”考驗城市“良心”	129
郎咸平說 政府執政思維要從“地上經濟”轉換到“地下經濟”	131
一、中國地下管網建設，一言以蔽之：“亂到驚心動魄”	131
二、青島爆炸案絕不是孤例，中國沒有一個城市能釐清地下管網路綫	132
三、GDP不能只和地面建設掛鉤，地方政府必須整飭地下管網	135
“三言”堂 地下建設才是“根”	137
一、地方政府只求表面風光，不顧地下“城市良心”	137
二、修建“共同溝”，誰出錢？誰建溝？誰入溝？	140

第三篇 金融變局迫在眉睫

第九章 金融困局·百姓困惑	145
郎咸平說 自私自利的中國金融業，怎麼可能為老百姓服務？	147
一、中國股市：先天不足、實體經濟萎靡，百姓不敢投資	147
二、中國保險業：停留在美國100年前水平，還在靠欺詐賺錢	150
三、國有銀行壟斷，最終導致老百姓遭遇“負利率”	152
“三言”堂 中國金融“一身病”	155
一、光大“烏龍指”：讓中國證券界的“業餘”素質原形畢露	155
二、“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中國保險人懂嗎？	156
三、上海自貿區是中國銀行業改革的新希望	159

第十章 民營銀行“千呼萬喚始出來”	161
郎咸平說 中國不需要以賺錢為目的的民營銀行	163
一、金融危機時，銀行規模越大，風險越大	163
二、中國銀行業“潛規則”：民營銀行很難做大	165
三、“台州模式”是中國民營銀行的生存範本	168
“三言”堂 請政府“放養”民營銀行	171
一、中國只有一家銀行，它由國有五大行和“一行三會”組成	171
二、辦民營銀行重在實幹，很多空想出來的問題是杞人憂天	173
三、民營銀行和國有銀行“打架”，政府不要“管閒事”	174
第十一章 馬雲的勇敢者遊戲	177
郎咸平說 “紅海”廝殺中的“幸存者”馬雲	179
一、中國金融、貿易服務水平低成就了馬雲	179
二、電商競爭激烈，馬雲靠頑強的毅力殺出重圍	181
“三言”堂 馬雲：一個有價值觀的梟雄	184
一、“時勢造馬雲”	184
二、商業銀行非常恐懼阿里巴巴	188
第十二章 “餘額寶”讓金融界“地動山搖”	191
郎咸平說 “餘額寶”將開啟中國金融改革新紀元	193
一、“餘額寶”在銀行業改革中起到了“鯢魚效應”	193
二、“餘額寶”制勝絕招：降低成本+吸引“草根”散戶	195
三、如果不受政府管控，“餘額寶”們將對商業銀行造成致命打擊	198
“三言”堂 阿里巴巴號“航空母艦”駛來了	199
一、“攪局者”馬雲能激活“躺著賺錢”的銀行嗎？	199
二、開放的“平台”才是阿里巴巴最恰當的發展路綫	202

第四篇 社會危機一觸即發

第十三章 老有所養，太難了！	207
郎咸平說 養老制度先天畸形：“中國不許見白頭”	209
一、“以房養老”、“男耕女織”，中國養老體系現狀嚴重畸形	209
二、養老難原因：獨生子女政策、歷史“隱性債務”及養老金“多軌制”	211
三、養老只能靠自己？	216
“三言”堂 “怕老”的中國	219
一、中國特色：“以房養老”	219
二、養老無出路：公立養老院床位緊張，民資入行受盤剝	222
第十四章 中國為甚麼缺一口“安全奶”？	225
郎咸平說 用完善的食品安全體系，讓老百姓安心養孩子	227
一、“三聚氰胺後遺症”：我們能從哪裡為孩子找到安全奶粉？	227
二、政府必須對有毒食品“零容忍”	229
“三言”堂 愁死人的中國乳業	232
一、打擊紐西蘭乳品，是中國奶業“自衛反擊戰”？	232
二、中國奶業產業鏈，就是一筆糊塗賬	235
第十五章 我們給孩子種的是疫苗，還是“禍根”？	239
郎咸平說 中國疫苗產業鏈畸形，滋生腐敗和醫療事故	241
一、疫苗事件反思一：新生嬰兒都需要打乙肝疫苗嗎？	241
二、疫苗事件反思二：由政府掌控疫苗市場選擇權，合適嗎？	243
三、疫苗事件反思三：接種國產疫苗到底有多危險？	245
“三言”堂 毒疫苗最終“殺死”的是政府公信力	247
一、中美疫苗市場皆壟斷，中國企業靠關係，美國企業靠實力	247
二、既然不是因為疫苗，17個嬰兒到底為何死亡？	249
三、疫苗產業應該由政府完全壟斷？	251

第十六章 中國教育病根在“公平”	255
郎咸平說 中國教育：不患寡，患不均	257
一、想上清華、北大就不可能“減負”	257
二、生源分流：美國依據“財富制”，日本依據“公平制”	258
三、中國生源分流是獨特的“特權制”	260
“三言”堂 “寒門貴子” 考驗教育公平	263
一、教育體制不改革，減負根本就是個“偽命題”	263
二、“公平的教育”只在傳說裡？	264

序言

“新政”能否改變中國？

我在 2006 年的新年感言裡說過，我不反對改革，但我主張反思改革路徑，並將自己定位為“改革反思派”。在對過去十年改革的經驗教訓反思的過程中，我發現了經濟、社會、政治領域的很多問題，以及相互之間的關聯性與內在邏輯，這也是我在本書中觀察、分析經濟與社會熱點問題的基本思路。

從 2012 年十八大順利完成領導班子交接，到 2013 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及剛結束不久的 2014 年全國“兩會”，我們看到了從理念到政策層面出現的積極變化，可以說改革已經再出發。但在這裡，我要提醒那些只看表面現象的盲目樂觀派，不客氣地講，我認為我們的經濟社會仍然處在比較危險的邊緣，而接下來的改革，不但需要清理多年積弊，而且必須要突破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特別是中層官僚的阻撓。可以說，未來十年是從“摸著石頭過河”到“打碎石頭過河”，從“亂局”走向“變局”的關鍵十年。

一、我多麼希望我以前所說的都是錯的

大概從 2004 年，我反對在國企改革過程中，國企高管以市場化名義侵吞國有資產的“郎顧之爭”開始，到 2008 年，我又強烈反對中央政府出

台的名為救市、實為權貴解套的四萬億計劃，因此很多人給我貼上了“改革反對派”的標籤。可奇怪的是，每當中國經濟問題屢屢被我言中時，又有人出來說，郎咸平就只會罵，缺乏建設性的意見，希望我能給出具備可操作性的解決方案。在這裡，我想反問一句，我的建議有人在聽嗎？聽了會實行嗎？這就是在中國做一個學者的悲哀。所以，此時此刻，我多麼希望我說的都是錯的！

1. 我不反對國企改革，但反對以市場化的名義侵吞國有資產

各位一定聽說過這樣一句話：不是所有叫作改革的東西，都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我覺得用這句話來概括我對國企改革的觀點再合適不過了。2004年，我之所以敢站出來炮轟顧雛軍在收購柯林格爾等公司過程中的國有資產流失，並不是因為我反對國企改革，而是反對那些“藉改革之名，行侵吞國有資產之實”的偽改革。

十年過去了，到今天我對國企改革的觀點依然沒有變。我們的很多國企，因產業政策和企業治理方面存在的問題，使得它們看起來虛胖，但實際上並不賺錢，它們依靠壟斷地位、資金上的先天優勢以及各種補貼生存。國企存在的腐敗和低效率，既是不爭的事實，也是國企改革的主要原因，但問題是究竟怎麼改。那些以市場化為名的所謂改革者，盯著的是國企的產權，他們呼籲把國企賣掉，賣給那些有企業家才能的人，讓他們去經營。但其實是希望將原來國企的巨額補貼和免費資源隨著企業改制，放入他們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腰包，隨後再以私有產權神聖不可侵犯為由，把這種特殊利益合法化、私有化。

我是“喝資本主義奶水”長大的經濟學家，當然知道產權和企業家才能的重要性，但問題是真正意義上的改革，必須讓絕大多數人，特別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受益，而不是讓極少數人一夜暴富。20世紀90年代的國

企改革，有多少國有資產流入私人腰包，又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一夜之間陷入困境，結果差點導致大規模的社會動盪。今天，國企改革所要解決的問題和 20 世紀 90 年代相比，雖然已有很大不同，但如果按照“一賣就靈”的路子走下去，我敢肯定地說，結果只能更壞而不是更好。

當然，我仍然希望我說的都是錯的。

2. 我不反對救市，但反對以救市的名義為權貴解套

過去幾年，我一直在厲聲反對“四萬億投資計劃”。但不可否認的是，它是我釐清當前國內複雜矛盾、挖掘表層現象下深層規律的最佳樣本。

2006 年前後，我就指出中國經濟存在八大危機——資源過剩、產能過剩、地方債務危機、通脹危機、民營企業危機、銀行危機、房地產危機和消費危機。一時間，有媒體稱我為唱衰中國經濟的“烏鴉”。兩年後，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並且迅速席捲全球。受次貸危機影響，中國經濟面臨增長乏力、外部需求放緩等前所未有的困難局面。政府不得不承認，中國經濟存在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結構性問題。

而在 2008 年前後，我大聲疾呼——反對政府“四萬億救市”為權貴解套，並提出政府應“放棄保八，藏富於民”。當時，有學者立刻批駁我無知，並聲稱，中國通過經濟刺激政策可避免大蕭條，即便有通貨膨脹也值了。各位，結果怎麼樣呢？由數據來看，無論是我們手中鈔票的真實購買力，還是我們官方衡量經濟增速的 GDP，顯示的結果就是：我們在經歷“滯脹”，而且已經至少持續了三四年之久。為甚麼呢？因為自 2008 年政府名為救市、實為權貴解套的“四萬億投資計劃”之後，我們就是在經歷一場“虛假的繁榮”。

到今天，又是五六年過去了，但我依然堅持，中國經濟需要“救市”，但不是砸向基建工程，讓冷的產業更冷，比如中國製造業；讓熱的產業更

熱，比如“鐵（鐵路）公（公路）基（基礎設施）”等 GDP 工程，而應該是扶持民營企業、提振內需，從而拯救近些年來已經持續蕭條的製造業，實現藏富於民。

3. 我支持反腐敗，但反對高薪養廉和運動式反腐

2013 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一個月，一份由官方智庫研究、被稱為“383 方案”的改革方案在網上廣為流傳。其中，關於預防和懲治腐敗，“383 方案”提出建立廉潔年金制度的構想。具體表述為“建立廉潔年金制度，公職人員未犯重大錯誤或未發現腐敗行為的退休後方可領取”。這個構想可以理解為一次性支付的高薪養廉政策。那麼老百姓交足高賦稅後，就能養出兩袖清風的官員嗎？很遺憾地告訴各位，高薪不能養廉。那麼，像俄羅斯普京那樣，憑藉領導人的鐵腕，開展“運動式反腐”行不行呢？我認為短期內可能有點效果，但長期看是不能從根源上解決問題的。為甚麼呢？各位有興趣可以閱讀我在《郎咸平說：讓人頭疼的熱點》一書中的相關章節。那麼，怎樣才能從根子上預防腐敗呢？對於這個問題，政治學學者可能會從民主和法治等制度建設層面提出建議，但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給出的辦法是強化預算制度、公佈政府審批清單以及給市場放權。

通過預算制度預防腐敗，就是把政府的所有收支，事無巨細地向社會公佈，讓每一分錢的開銷都在陽光之下進行，公開透明是最好的“防腐劑”。給市場放權，我認為是預防、治理腐敗的釜底抽薪之策，把市場和政府的界限劃清楚，市場自己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再多插手，自然從源頭上鏟除了腐敗的土壤。而要給市場放權，首先需要政府公佈行政審批的權力清單，凡是清單之外的，都應該由企業或社會組織自行解決，政府無需也不能再去以審批名義謀取部門利益，這和李克強總理最近一直強調的“法無禁止即許可”是一個意思。

二、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是政府不甘心退出市場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中國經濟，不論官方數據多麼的提振人心，但真相就是我在《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邊緣》一書開篇的那句話——“我們正在經歷衰退”。但可悲的是，當時我們選擇的不是退出市場，相反卻是在出口萎靡的情況下，依靠政府投資硬撐起 GDP 增速，製造“虛假的繁榮”。我們選擇的這條路，必然帶來“經濟滯脹”的惡果。

1. 從宏觀層面看，政府主導的四萬億是經濟改革的嚴重倒退

由政府主導的“四萬億投資計劃”，主要是透過行政指令讓我們的國有五大商業銀行，將貸款有針對性地發放給各級國企，而且主要流向基礎設施建設。請各位注意，資金作為非常重要的生產要素，應該由市場進行配置。我們的政府這樣越俎代庖，造成的結果就是資金流向了回報率低且回報週期緩慢的“鐵公基”，還有原本應在經濟危機中自然淘汰的很多落後國企，它們就因為有各級政府託底、背書，拿到了來自國有五大商業銀行的巨額貸款才得以帶病延年。

各位曉得嗎？2000 年的時候，中國的石化、鋼鐵、紡織等國有壟斷行業相繼出現了嚴重的下滑情況，政府提出對它們實行“調整振興思路研究”，同時發展新興戰略產業。之後，政府又進一步地提出了“從低附加值轉向高附加值升級，從高能耗高污染轉向低能耗低污染升級，從粗放型轉向集約型升級，從生產製造向研發設計升級”的戰略。也就是說，2008 年拿到貸款的很多國企，它們都屬於應該被淘汰或者至少也是接受升級的那一類。但“四萬億投資計劃”入場後，這些落後產能企業不僅沒有被淘汰掉，反而活蹦亂跳，甚至擾亂市場秩序，而原本最富有活力和創造力、且在全球危機中依然選擇繼續經營的民營中小企業，卻因為資金鏈斷裂，

被清出市場。

“四萬億投資計劃”的投放，不僅對十多年前就開始實施的產業轉型升級戰略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而且暴露出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那就是政府不甘心退出市場，按照既得利益者的要求而不是市場規律辦事，結果不但保護了落後產能，而且大大增加了今天經濟改革的難度。

2. 從微觀層面看，民間資本追逐資產泡沫是沒有選擇的選擇

民營企業是經濟中最活躍的主體，但由於政府代替市場選擇了基礎建設、落後產能等行業，由民營企業主導的大部分製造業，比如加工貿易等行業迅速凋落。與此同時，我們的金融業嚴重缺乏能讓老百姓實現資產保值、增值的投資服務，民營企業在內外交困的情形下，不遠離製造業去炒房子、炒錢，還能做甚麼呢？

次貸危機期間，或為避風險主動停產，或因資金鏈斷裂無法繼續經營的民營企業家們，在賣掉企業後又做了甚麼呢？撇開那些投資移民的人不談，我發現留下來的人大部分都選擇將手裡的閒散資金投入到房地產或者官方、非官方的借貸服務裡。他們為甚麼做這樣的選擇？因為我們的政府只給他們留下了這類沒有選項可選的選擇題。

各位，我在次貸危機發生時，不僅呼籲政府儘快“救市”，同時，堅決反對“四萬億投資計劃”大搞“鐵公基”建設，而建議政府扶植製造業，藏富於民，問題是，有人聽嗎？

3. “市場化程度不夠”，是徹頭徹尾的偽命題

從1978年農村的“聯產承包”改革成功之後，中國就開始流行“市場萬能的神話”。迷信“市場神話”的結果，就是我們終於走到了“教改之後上不起學、醫改之後看不起病、房改之後買不起房”的地步。各位，

請問，這是“市場化程度不夠”的問題嗎？我們是否只要把壟斷國企賣給私人，名牌大學交由私人經營，一流醫院完全由私人市場化運作，房地產完全由房地產商操控，問題真的就能迎刃而解嗎？

其實，我們現在所說的改革，絕不是一個剛剛開始的新征途。它完全可以追溯到 2003 年、1992 年、1978 年。最近 20 年，在向市場化轉型的過程中，因為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能力依然過分強大，而對養老、教育、食品安全等本屬於政府職責範圍內的民生問題，卻投入太少，甚至直接將教育、醫療等民生問題推向市場，導致了看病難、上學難、住房難，所謂的新“三座大山”，再加上對於那些完全可以由社會自我管理的領域，政府不敢也不願放手，結果就導致了政府自身的改革，以及社會領域的管理創新遠遠滯後於經濟市場化的步調。

悲哀的是，在權力和資本兩者的支持下，總有人將政府不願退出市場而回歸民生這一根本問題，錯誤地歸結為市場化程度不夠。

三、改革停滯，究竟是缺乏共識，還是利益集團阻撓？

我們的政府為甚麼會在 2008 年選擇“飲鴆止渴”的“四萬億投資計劃”，而沒有考慮接受我“放棄保八，藏富於民”的建議，也就是類似於美國奧巴馬政府的做法呢？原因並不是所謂的缺乏共識，而是中層官僚不答應。

1. 中層官僚不作為甚至陽奉陰違，阻礙改革

2003 年 10 月發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作為時任政府上任伊始發佈的施政綱領，和我們現在熱議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

的決定》（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一樣，在當時被看作未來十年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向。仔細閱讀這份十幾年前發佈的《決定》不難發現，我們現在面臨的很多問題，比如社會保障、再就業等問題的解決方案，其實早在2003年就已經被寫進了黨和中央政府的施政綱領裡。

那麼，這些早在2003年就做出部署的工作，為甚麼直到2008年全球危機爆發，乃至2013年都沒有得到有效的推進？我認為原因就是各部門和地方政府中的中層官僚不作為，甚至是陽奉陰違，阻礙改革進程。在政府主導經濟、審批氾濫的情況下，別說發改委這樣手中握有大項目審批權力的部門，即使在地方，一個企業要完成註冊或者項目審批，至少也要蓋幾十個部門的公章才行。如此高密度的審批，絕不是為老百姓服務那麼簡單，而是只有審批，官僚才會有尋租空間。這就是過去這些年改革“雷聲大，雨點小”的原因。

2. 官商勾結形成的利益集團，在各個層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場化改革

我們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時間裡，一直享受GDP高速增長帶來的經濟發展，但與此同時，地方官員的升遷、政績也成了以GDP為綱——GDP增速越高，升遷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升遷帶來的好處則是更大的權力，以及權力變現的規模。請各位設想一下，一旦中央政府容忍GDP增速放緩，並伴有大批失業人口，那麼第一，地方官員失去了高GDP增速這個升遷砝碼，至於造成的產能過剩等不良後果，則是統統留給下一任去解決；第二，還要負擔起救助失業人口，並對其進行再就業輔導的職責，避免在任期內產生重大社會動盪。前者是做好有功，後者是做好無過。

我舉個例子證明，2013年5月，新一屆政府上任伊始，發改委就在地方政府的鼓動下，向國務院上交了2.0版本的“四萬億投資計劃”，其總額高達40萬億人民幣。好在李克強總理及時叫停，否則在成全一

些人的政績工程的同時，全中國從經濟到社會都可能會被拉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2008 年時，為應對全球經濟危機，中央政府不得不採取飲鴆止渴的方式干預經濟，但即使如此，四萬億資金的走向，可選擇的除了注入國企和“鐵公基”之外，還有放棄保八，將資金注入民營經濟或者社保體系等。但尾大不掉的中層官僚集團和國有企業，同擁有行政權力的事業單位、社會組織，以及官商勾結形成的壟斷利益集團一起，在各個層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場化、去行政化等改革。這些都讓他們獲得了另一個更響亮的名字——“既得利益集團”。

3. 改革已到了政府拿起“手術刀”的時候

當我們翻看 1993 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2003 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以及 2013 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就會發現對於“經濟結構、收入分配、就業問題、資源環境、城鄉矛盾”等問題的調整、改革思維其實是一脈相傳的，之間基本是遞進關係。

時至今日，中國各方面矛盾已經尖銳化到不容打馬虎眼的地步。新任政府接手的問題都是前人擱置的難題，矛盾甚至尖銳到眾人皆知、無法繼續擱置的地步。所以當新一任政府提出“深化改革”，並且將打擊矛頭明確指向既得利益集團的時候，得到了民眾空前團結的支持。即便僅僅是面對這兩年侵襲全國各大主要城市的霧霾，恐怕再難找出延遲改革的藉口了。

改革的勇氣，從壯士斷臂退到壯士斷腕，如果再退一步，恐怕感覺就是十指連心，動哪一根都下不了手。但問題是危機倒逼改革，在改革的窗口期越來越狹窄的今天，政府已經到了拿起“手術刀”的最後關頭，退就是死。

四、“新政”能否改變中國？

從 2012 年十八大之後新一屆政府上台，中國開始了新的政治經濟週期，到 2013 年十八屆三中全會結束後發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面佈局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建設“五位一體”的改革，以及隨後陸續出台的政策規定，我們可以看到從理念到政策層面出現的積極變化，我將這兩年內出現的變化統稱為“新政”。

1. “新政”開始改變中國

從本書的主要內容，比如新城鎮化、反腐敗、上海自貿區等，都可以看到“新政”的影子。那麼，“新政”能否改變中國？對此，我持樂觀態度。以經濟改革為例。《決定》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

體現這些理念的政策之一就是大力推動新型城鎮化，由它取代 2008 年推出的“四萬億投資計劃”，成為中國經濟未來十年的主要發力方向。在官方的解讀裡，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不以犧牲農業和糧食、生態和環境為代價。實現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共同富裕。”

我對新一任政府履新以來的施政綱領以及具體的改革措施，到目前來看持謹慎樂觀態度。“五位一體”的改革佈局，和我一直強調的“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政府的歸政府”、“釐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這些核心理念不謀而合。而且，2014 年 2 月初，國務院決定向社會公開國務院各部門目前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清單，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但從清

單的內容來看，我覺得實質性的東西還是太少，進展得還是太慢。

我非常贊同李克強總理在剛結束的 2014 年“兩會”記者招待會上說的，簡政放權的改革是“開弓沒有回頭箭”。所以，當務之急就是儘快廢除那些不必要的，卻又涉及政府部門巨額利益的審批事宜，並儘快公佈行政審批清單，將簡政放權進行到底。因此，“新政”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中國，說到底還是取決於改革的決心和勇氣。

2. 改革關鍵十年，政府應該幹甚麼？

政府除了儘快與市場“換手”之外，我覺得最主要的是必須改變這些年來在市場監管上的不作為，保護知識產權、反壟斷以及解決就業、教育、醫療等民生問題，提高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質量。具體包括：

（1）不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成為一句口號。首先，政府不能越過市場的邊界，而應在食品安全、教育公平、城鄉二元、收入分配、醫療、養老、就業輔導、環境治理、徵地拆遷、社會治安等方面提供基本的保障和公平的服務。其次，從政策層面，打破國企壟斷，逐步放開行業准入門檻，讓“黑名單”制度取代“白名單”制度；給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同等的地位，在完全開放的市場裡讓二者公平、充分地競爭，杜絕一邊產能過剩、一邊無米下炊的現象。

（2）我們的政府還要繼續削減不必要的行政審批權，同時加強對各級政府機關和企事業單位，以及國企的監督，徹底杜絕權力尋租、腐敗的空間；改變地方政府官員政績考核以 GDP 為綱的錯誤標準，讓老百姓的幸福指數取而代之。

（3）不要把新型城鎮化搞成又一輪建設“大躍進”，它的核心是讓已進城農民工擁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在改造現有農村的時候因地制宜，在不破壞環境的情況下進行建設，同時在養老、醫療等領域逐步實現

城鄉居民同等待遇。說得直白一些，如果能讓已經進城的民工擁有真正的市民身份，中國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就等於完成了 60% 以上。

（4）密切關注金融市場可能出現的眾多危機，比如企業債券、理財產產品違約、地方政府違約、“影子銀行”等，大力防範通貨膨脹問題；以上海自貿區為試點，大力推進金融改革、創新，同時還要對“餘額寶”等互聯網金融，以及規模小但提供市場化服務的城商行給予和現有金融體系同樣的地位，讓各種主體在市場上公平競爭，讓老百姓獲得更多、更實惠的金融服務。

（5）重振製造業。製造業從“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的轉型，不僅能夠提高國家經濟的競爭力，而且是解決就業問題的基本保障。但必須注意的是，政府只是營造良好公平的營商環境即可，而不是越俎代庖替市場決定誰應該得到發展所需的生產要素。

以上內容是我在《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邊緣》、《郎咸平說：讓人頭疼的熱點》和本書中著力想表達的核心理念，可以作為我對中國經濟過去五年，從熱點聚焦、數據透析到問題剖解所做的反思。

本書的寫作主要依據我在廣東衛視所做的《財經郎眼》節目內容，但我和我的團隊在後期還做了大量的數據收集和研究工作。我要感謝我的以馬行空為主的研究團隊，沒有他們的資料提供和初步研究，就不會有本書的出版；同時也要感謝出版社的編輯們，他們研究性的編輯工作，也為本書增色不少。

郎咸平

第一篇

中國改革重裝上陣

第一章

“新型城鎮化”將是誰的盛宴？

2013 年 12 月，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新型城鎮化的工作思路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以有序實現市民化為首要任務。2011 年中國城鎮化的官方統計數字是 51.27%，但其中城鎮戶籍人口所佔比例卻只有 35%，這之間的落差是數以億計、還未能與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的廣大農民工以及他們的家屬。

關於“新型城鎮化”，郎咸平教授說：

- 農村進城務工人數不再猛增，地方政府建設“大躍進”只會製造“空城”。
- 地方政府要為進城務工者及其家屬支出大量財政補貼，“城鎮化”成本過高。
- “新型城鎮化”應以人的舒適為主，不要盲目建大城。

“城鎮化”讓北京成“首堵”，上海忙賣地

回顧 2013 年，有四個城市一定要進入年終盤點之列。第一個城市就是北京。

2013 年北京用一個字來概括，就是“堵”——“堵城”、“首堵”。北京的朋友說，在北京一天只堵一次車，就是“從早堵到晚”。你如果不想忍受堵車也可以，就得去擠地鐵。北京早高峰的地鐵，簡直讓你毫無尊嚴。

第二個城市我們要說上海，還是一個字——“忙”。忙甚麼呢？整個 2013 年，上海都在忙著賣地，賣地收入也是全國最高的。賣了地，有了錢，於是當地高級法院的一些法官開始集體嫖娼，被曝光後，被開除了黨籍。但是人民群眾不幹了，說“他們嫖娼成了敗類，現在把他們算成群眾，我們又不是垃圾回收站”。

第三個要盤點的城市是長沙，一個字是“火”，因為湖南電視台在 2013 年出了兩檔比《財經郎眼》稍微火一點的節目，一個是《我是歌手》，一個是《爸爸去哪兒》。

第四個城市就是廣州，用一個字盤點，就是“猛”。為甚麼？因為廣州出了恆大，太猛了。恆大足球隊出門“幹掉”了韓國足球隊，拿到了亞冠的冠軍。

盤點完 2013 年的四大城市，我又要開始作詩了。“城市如此多嬌，引無數屌絲競折腰。”過去是農村包圍城市，現在是城市逆襲，反包圍農村。為甚麼？因為貫穿 2013 年並且延續到 2014 年的一個關鍵詞，叫作“新型城鎮化”。那麼“新型城鎮化”對我們老百姓有甚麼影響？它“新”在哪裡？

郎咸平說

“新型城鎮化” 的核心應是 “人的城鎮化”

一、“新型城鎮化”：以人為本，不再大搞基建

從 2013 年開始，“城鎮化”幾乎成了一個專有名詞，甚至是很多企業家、大學生未來夢想的一個重要基礎。為甚麼會有“城鎮化”這種說法？我們用數據說話。目前中國的城鎮化率是 53.73%；如果按照戶籍人口算，那麼我們的城鎮化率只有 35%。和先進國家平均 70% 以上的比率相比，我們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按照外國媒體的報道，未來十年我們大約會有 4 億人從農村遷入城市。

所以包括樊綱等在內的很多學者，依靠這個數據擬定出一個“城市化”藍圖。比如說，4 億人進入城市，肯定得買入固定資產——房子。如果按照平均每人的購房費用是 10 萬元計算，那麼 4 億人就會產生 40 萬億的購房需求。這是不是可以拉動中國的房產消費，拉動中國的 GDP？現在這個聲音成為了輿論的主流。如果這個假設真的發生也還好，但是我更關注中國會發生“逆城鎮化”。

“逆城鎮化”一般指城市人口向鄉村和小城鎮回流的現象。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範圍內城市化發展的總趨勢是不斷地

集中化、大型化。但同時在少數經濟高度發達、城市化趨於飽和的國家，投資方向從大城市轉向小城鎮與鄉村地區，出現了城市中人口減少、經濟衰落的現象，這種衰退在城市的“內城區”(inner city)顯得特別明顯，而鄉村地區人口卻比以前增加。

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在京舉行，提出了六大任務。我驚奇地發現，沒有一項任務是要擴建城市的；而且，中央領導特別提出“以人為中心的城鎮化”，也就是“新型城鎮化”，這和我們過去提出的40萬億規模的城鎮化完全不一樣。

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針對推進城鎮化，提出了六項主要任務：第一，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主要任務是解決已經轉移到城鎮就業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問題，努力提高農民工融入城鎮的素質和能力；第二，提高城鎮建設用地利用效率，嚴控增量，盤活存量，優化結構，提升效率，切實提高城鎮建設用地集約化程度；第三，建立多元可持續的資金保障機制，要完善地方稅體系，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建立健全地方債券發行管理制度，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城市公用設施投資運營；第四，優化城鎮化佈局和形態，儘快把每個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開發邊界劃定；第五，提高城鎮建設水平，要注意保留村莊原始風貌，慎砍樹、不填湖、少拆房；第六，加強對城鎮化的管理，培養一批專家型的城市管理幹部，用科學態

度、先進理念、專業知識建設和管理城市，城市規劃要保持連續性，不能政府一換屆，規劃就換屆。

二、農民工數量不再激增，地方政府搞的建設“大躍進”無人埋單

但是我後來發現，地方政府和中央的語調完全不一樣。地方政府是怎麼理解“城鎮化”的？就是“建設、建設，再建設”。我在這裡給各位提供一組非常震撼的數據。我們的發改委針對 12 個省的 156 個地級市做了調研，並在 2013 年 9 月公佈出結果，發改委發現 92.9%，也就是 145 個城市正在搞“造城運動”。其中 12 個是省會城市，要建設 55 個新城區，也就是說，每個省會平均建 4.6 個新城區。另外 133 個地級市要建設 200 個新城區，平均每個地級市要建造 1.5 個城。甚麼是新城區？其實就是一個新城了。

我們發現，這 145 個地級市，它們的平均舊城面積是 115 平方公里，建的新城區平均是 63.6 平方公里。從面積來看，新城區面積是舊城區的一半多一點。但是請各位注意，舊城區大多是矮小的平房，但新城區都是高樓大廈，它們兩個在容納人口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新城區雖然只有舊城區 50% 的面積，但是它們兩個的承載人口數量是一樣的。

另外的數據也顯示，我們的城市舊城區總共承載了 7.1 億人口，而“造城運動”裡的新城區，它們的承載人口總和也將是 7.1 億左右。那麼我們到底有多少農民工可以進城呢？我們驚奇地發現，15—60 歲

的可勞動人口大概只有 2.62 億，他們是可以進城務工的，這其中 38% 住在城市的職工宿舍，還有 33% 是自己租房子，還有 10% 住在工地裡，真正買房子的人口只有 0.6%。這也表示，已經進城的 2.62 億農民工在住房問題上，已經達到了相對固定的狀態，也就是說不需要住進所謂的新城區。

有人會說，我們叫他們買房嘛。就目前 2.62 億的農民工來看，他們的家眷加在一起大概比 1.4 億少一點，所以農民工及其家眷一共大概有 4 億人口。我們不拿北京、上海這種一綫城市的房價來計算，而是假設這 4 億人口都要在三、四綫城市買房，每人平均 10 萬元購房成本的話，4 億人口需要 40 萬億來買房子。我再告訴各位，2.62 億農民工每人每年的薪水是 2.7 萬元，如果他們的儲蓄率是 30% 的話（這個比例已經非常高了），即使這樣他們也需要存 20 年的錢，才能夠在三四綫城市買到房子；如果他們的儲蓄率只有 10%，就要存 60 年才能買到房子。但我要提醒各位，每人年收入 2.7 萬元是現在農民工的平均薪水，而房價在不停地漲。如果繼續這個漲勢，農民工攢一輩子錢也買不起房。

還有人問，2.62 億農民工還有後代，新一代的農民工會填充農民工的總數。如果你這麼想問題，那就是大錯特錯。為甚麼？我們用數據說話。目前我們的農村戶籍人口有 8.8 億，佔中國總人口 13.5 億的 65%。我們繼續對這部分人群做細分，把 15 歲以下和 60 歲以上的人口去掉，還剩下 6.16 億的人口，其中一半是女性。成年女性也是勞動人口，但是她們在結婚之後大多被生小孩、照顧小孩、照顧老人等瑣事佔據，使得勞動力大打折扣。因此，真正有效的農村勞動力只有

3.08 億男性農民。再說這 3.08 億人，有一部分人是留在農村的，他們經營餐廳、小賣部等，這需要 3000 萬到 4000 萬人。把這些人扣除之後，我們驚奇地發現，就剩下 2.62 億可供城市雇用的農村勞動力。換句話說，未來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總數不可能有非常大的增長。那麼“造城運動”產生的能夠容納 7.1 億人的新城區怎麼辦？沒有人來填充，這就是地方政府搞建設“大躍進”的結果，造成資源的大量浪費。

三、“逆城鎮化”危機：有效勞動人口減少，財政不堪重負

各位覺得這就是最終的悲劇了嗎？錯了，我總結出的“逆城鎮化”一旦發生，才是最可怕的悲劇。甚麼是“逆城鎮化”？就是城鎮化的質量大幅度降低，它不僅不會帶來正面效果，反而會帶來極可怕的負面效果。這主要是由兩個危機造成的。第一個危機是 2.62 億有效農村勞動人口，這個數字要保不住了。為甚麼？我們國家整體的老齡化速度太快，有效勞動人口下降。拿 2012 年和 2011 年的有效勞動人口（15—60 歲）數字做比較，下降了 345 萬人。

第二個危機是，如此大規模地搞城鎮化，讓那麼多農村人口遷入城市，但是在有效勞動人口下降的大背景下，最後是誰遷入了城市呢？就是老弱婦孺。接下來需要考慮的是，我們拿甚麼安置這些人。

就拿現有的 2.62 億農村勞動力和他們的 1.4 億家眷為例。為了安置這 4 億人口，我們的政府需要拿出多少錢？根據社科院的調查，為了解決這些進城打工者和家屬的教育、保障房、社保等問題，政府要為每個人平均一次性投入 2.6 萬元，落實到 4 億人頭上，就是 10.4 萬

億。這筆錢是純粹的成本投入，又不像固定資產那樣產生回報。請各位再注意，我們的政府財政收入基本都是連年遞增，然後從 2011 年開始邁過 10 萬億門檻，到 2013 年的時候達到 12.9 萬億。看上去非常多，但是在解決農民工進城問題上，還是會覺得負擔很大。所以我認為第二個危機更可怕，它讓各個城市的財政不堪負荷。

我得出的結論就是，習主席提出的“以人為本的城鎮化”是講到了問題的核心，我們接下來應該思考的不是怎麼把城市建得更高、更大，而是思考如何讓農村人口即使還留在農村，也能過得更好。

“三言” 堂

本期嘉賓：王福重（知名學者，經濟學家）

“新型城鎮化”：不是建新，而是補舊

一、“城鎮化” 核心問題一：農民是因為甚麼進城的？

王牧笛：我想先請教王老師一個問題，當下的中國不實施“城鎮化”行不行？我們延續“鄉土中國”的思路行不行？

王福重：“城鎮化”是必須進行的，因為城市帶來更多的文明和價值。無論是中國還是歐洲的文明史，其實都是城市史，人類的科學技術、文化等一切東西基本上都是起源在城市。人生活在城市會讓你更安全、更長久、更多姿多彩。人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是世界文明進程的一個必然趨勢，而且中國還遲了一步。中國過去 35 年一直在進行“城鎮化”，在未來也會逐步強化，以後 90% 的中國人進入城市是有可能的。

郎咸平：你剛才講到了歐美國家的城鎮化，這是一種自然的城鎮化。甚麼意思？就是一個城市建立起來以後，會有很多的工廠在這個城市裡，需要有很多的農村人口來填充勞動力空缺。這些人進入城市以後，打工賺錢、買房子然後定居下來，自然形成了城鎮。城市本身在成長、在創造，它所產出的工業品與農產品之間形成剪刀差，吸引

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然後享受多姿多彩的城市生活。但是中國的情況是不一樣的，我們搞的是城鎮化“大躍進”。

王牧笛：中國的“城鎮化”目前有幾種模式。第一個是成都模式，也就是大城市帶大郊區發展；天津模式是宅基地換房集中居住；還有廣東模式，產業集群帶動人口集群；然後是比較著名的蘇南模式，也就是發展鄉鎮企業；最後是溫州模式，以個體私營企業為主體。兩位認為甚麼樣的“城鎮化”模式是比較可取的？

郎咸平：你剛才提到的幾個城市，其實它們的發展模式都是和當地的工業有關的。為甚麼？我們必須弄清楚農村人口來城市，他們必須要有工作，能夠賺錢，這種“城鎮化”才有意義。我一再和各位強調，生產力是非常重要的，它對一個城市的推動是起核心作用的。

王福重：我不贊同你們的說法，它們都不是“城鎮化”。比如說蘇南模式，甚麼叫發展鄉鎮企業？就是鄉裡、鎮裡，還有農村村集體辦的企業，現在它們都消失了，只剩下鄉鎮企業管理局。這種做法的本質是要農民“離土不離鄉”，不要進城，也不種地，就在農村直接建工廠。這不叫“城鎮化”，只是把原來在城市裡的一部分工業生產，轉到了農村，實際是“城市農村化”。“城鎮化”唯一的含義是不要農民和農村，比如我們現在經常聽說的“空心村”。

王牧笛：2013年年底媒體曾經曝光了兩個自然村，其中一個村只剩下3個老人和1個嬰兒；還有一個村，只有10個80歲以上的老人。

王福重：這就叫“城鎮化”，也就是破落的農村。養不活人，經濟不行，是因為城市規模小，城市大了就沒問題了。當然，我們現在“城鎮化”的方向肯定是不對的，那麼農民進城靠甚麼？第一，必須要改

革現行土地政策，不要認為土地不值錢，它是可以永久產生收益的，把未來的現金流折現到今天肯定能賣很多錢；第二，加強金融支持，不要小看金融，它可以“無中生有”。有了這兩個依靠，農民進城後，只要具有一定的勞動能力，他們就可以養活自己。

二、“城鎮化” 核心問題二：建大城還是建小城？

王牧笛：王老師的思路是，還是要建大城市。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某位領導不高興了。2014 年 1 月 6 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經濟之聲”廣播在它的官方微博裡，援引了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村鎮建設司司長趙暉的話，說：“不是每個城鎮都要長成巨人。我國過去幾十年城鎮化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大城市化，結果是拉大了城鄉差距。德國 70% 的城鎮人口居住在 2 萬人以下的小城鎮，人居環境比城市還好，居住的人群往往是中產階層和富裕階層。中國要大力發展小城鎮。”

王福重：我覺得不能這樣講。為甚麼？歐洲的情況是每個小城鎮住著的基本都是中產階級，大家收入不錯、彬彬有禮，周圍的環境也是鳥語花香。但是中國的情況是不同的。比如說，趙暉舉的德國的例子不適合中國。德國的人口並不多，只有 8500 多萬人。德國人口和適宜人居住的國土面積之比要比中國強很多。中國真正適宜居住的地方大多在東南沿海地區，現在的人口也很稠密。西部地區人口密度低，另外一種說法就是遍地小城鎮。如果我們堅持要建德國那樣的小城鎮，那現成的就有，還搞甚麼“城鎮化”？我認為要想搞好“城鎮化”，必須要適當地集中。

郎咸平：你的說法不對。我們過去的生活條件是很艱苦，原因是甚麼？我們過去對城市化沒有一個好的規劃，我來舉個例子。很多人在紐約上班，但是有多少人住在紐約市裡呢？我告訴各位，是非常少的人。紐約有非常便捷的大眾運輸系統，到了下班的時候，就把人流以最快速度全部輸送回去，疏散到新澤西州和紐約州上的小城鎮。在中國，甚麼叫高速公路？我們一般的中小城市都是環城公路上面找兩個點接上高速公路，全城的人想要出去都得通過這兩個點，肯定會造成阻塞。這是錯誤的設計，必然導致“城鎮化”最後使大城市負擔過重的問題。那紐約是怎麼做的呢？紐約市裡面就有 20 多條高速公路，直接連通城市的每個點。我在紐約的時候，只花 1 分鐘就能夠開上高速公路去上班。而且，同樣的資源在小城鎮可以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但我們完全不是這種情況。

王牧笛：王老師對於堵車應該也是深惡痛絕的。他曾經和我說過，以前帶著老婆去北京豐台體育場看劉德華的演唱會，結果堵車堵了四個小時。到了演唱會正趕上劉德華返場唱最後一首歌《忘情水》。

王福重：但是我認為“大城市病”被嚴重誇大了。為甚麼？比如說北京擁擠，但是大家又都在忍受。如果你問一個大學畢業生，你最願意去哪個城市？大多數人還是會選擇北京。我們看北京的周圍，比如說東邊的燕郊，它就是河北省廊坊市下屬的一個縣級市三河市的一個鎮，那裡因為緊挨著北京，集中了幾十萬人，每天都要從河北省到北京來上班。我們不能否認，這些人是自願的，沒有受到強迫，為甚麼？因為和留在家鄉的窮困相比，交通擁堵不是不可以忍受的。再說回交通擁堵的問題，這主要是因為我們的規劃有問題，我們就不要再

亂做規劃了。比如說紐約規劃得好，原因之一是它沒有把那麼多的政府機關和學校、醫院扎堆放在一起。

郎咸平：美國的規劃確實好，它把中央政府安置在了一個新的城——華盛頓特區。所以我們看到大量的人口向華盛頓特區集中，它又是一個很空曠的平原，這才是我心目中的“城鎮化”。

三、“城鎮化” 核心問題三：政府干預“城鎮化”的邊界在哪裡？

王牧笛：關於建大城還是建小鎮，我們留給官員去吵，我們暫時放下這個宏大敘事，聽一聽一個個體的案例，由一位農民工阿姨來講述屬於她的“城鎮化”故事。

來自湖南農村的何阿姨十幾年前來到廣州打工，一直從事清潔工作。丈夫和她一起在廣州打工，開小貨車。最近幾年推行“城鎮化”，何阿姨才有了醫保、社保，但是她的丈夫還沒有。孩子十幾歲了，被留在老家讀書。她覺得在廣州生活最大的不方便是：“在這個城市裡面甚麼都要錢，很麻煩。”何阿姨現在每個月花 600 多塊錢租房住，對於在廣州城買房只是想想，不可能實現。2014 年剛剛開始，如果許願的話，何阿姨希望在湖南家裡建一座像樣的房子，能把小孩接到廣州，和她在一起，希望親人平安、健康。

王福重：這個故事如果我們擴展一下，讓郎教授和她在湖南的家裡第一次見面。郎教授可能會說，你怎麼能到廣州這種大城市生活呢？那裡房價那麼高，而且大學畢業生都很難找到工作，但是她就在廣州生活下來了。而且我敢說，她還不想回到原來的村裡去生活。她

的孩子之所以還沒有來廣州，很可能是由於戶籍制度等障礙，入學比較困難。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大多數人都會在較大的城市生活下來。

郎咸平：我們必須弄清楚，她為甚麼能夠在廣州生存呢？她自己是做清潔的，她老公是開小貨車的，他們提供的服務是被城市需要的，使得他們能夠在城市有工作，賺錢養活自己。這屬於我一再強調的、自然的“城鎮化”，是我贊成的。我反對的是，搞城鎮化“大躍進”，完全不顧及大城市自然成長的客觀規律，硬把人口往裡面推，這是錯誤的。

王牧笛：最後，我引用一位經濟學家的話來做結尾。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說，“城鎮化”不是越快越好，也不是越高越好；“城鎮化”不等於消滅村莊；“城鎮化”不等於造城運動；“城鎮化”不等於“房地產化”；“城鎮化”不等於透支未來；“城鎮化”不等於攤大餅。